

学人关注

实践存档

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家庭问题是反映城乡流动与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也是研究婚恋问题的重要入口。《婚恋转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一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进行了深入调查与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面？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转型时期，农村务工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有着怎样的变化？农村青年的美好家庭生活秩序何以可能？《新女学》周刊就此采访了该书作者、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宋丽娜。

访谈提示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转型的女性处境与风险防范

对话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宋丽娜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家庭问题是反映城乡流动与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也是研究婚恋问题的重要入口。《婚恋转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版)一书从婚恋形态、婚恋路径、婚姻市场和婚恋价值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进行了调查与探讨，试图解释其行为逻辑及背后的社会性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面？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转型时期，农村务工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有着怎样的变化？农村青年的美好家庭生活秩序何以可能？《新女学》周刊就此采访了该书作者、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宋丽娜。

多元而复杂的婚恋现象

记者：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与打工经济的兴起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发生转型，出现了闪婚、离婚、婚外情、临时夫妻和光棍等多元婚恋现象，这背后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怎样的婚恋价值变化？

宋丽娜：多元而复杂的婚恋现象，反映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较为混杂的婚恋价值体系，既有传统婚姻伦理的留存，也有城市婚恋文化的影响。我认为其中一个基本线索是，以婚恋自由为核心的现代婚恋价值观已经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确立，而他们所面临的婚恋环境却更加复杂了，一方面是流动生活的动荡与漂泊，另一方面则是原有村庄规范的制约与拉力。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价值观呈现出四种变化趋势：从稳态的婚恋模式到多元化、流动性的婚恋实践；从道德伦理导向转向情感导向、利益导向；从公共性道德趋向私人性的体验；从结构性的干预到自主婚恋选择能力。

记者：您在书中专门讨论了工厂恋情的兴起与特点。如今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工从工厂走进新兴的快递和外卖行业，他们的婚恋实践和工厂恋情有什么异同？

宋丽娜：工厂恋情的主体是80后及一些90后，而现今不少90后及00后们则在快递、外卖等灵活就业的服务行业就业。他们这代人的入生经历不同，婚恋实践也必然有新的特征。我尚未对此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初步的感觉是，他们的婚恋实践是80后们的进一步演绎，如更加注重婚恋关系中的互动质量和体验、恋爱、婚姻、家庭相互分离，拥有婚恋主体性和婚恋自由权等。

农村务工女性地位的提升与遇到的风险

记者：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中，农村务工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有着怎样的改变？

宋丽娜：农村务工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有较大改变，如权利意识更强，地位提升明显等。这与婚姻市场的形塑有很大的关系。2000年左右形成的全国婚姻市场打破了传统婚姻圈维系的地方性的婚姻均衡。体现为男女之间的“婚姻梯度”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流向”，即女性更多地嫁往地理和经济条件好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适婚男女比例较正常，多数家庭有条件能够正常结婚；而在地理和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尤其是家庭条件差的男性，则很难正常婚配。为了应对这种不平衡，一些地方日益建构出了本地婚姻市场，即在特定地域范围内按照新型的婚配规则来缔结婚姻。

由于本地婚姻市场对于女性稀缺的体验更加明显，女性拥有更多的谈判能力和选择权利(甚至在再婚市场上)。女性在本地的婚姻市场上的高位激发了女性权益的增长和地位的提升。体现为在婚姻结合中，女性具有“要价权”；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女性的声音越来越重要，地位越来越高；所以，当下农村多数离婚都是女性提出的，她们更容易找到更好的归属，为此男性便会调整自身的行为，学会“爱护老婆”，并且“更加贴心”，以维系婚姻家庭生活的完整。整体上看，婚姻市场上的高位提升了

女性权利和地位，进而促发了农村传统婚姻家庭生活观念的改变。

记者：在“跨省婚姻”“结婚未成年”“临时夫妻”等婚恋现象里，女性是否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风险？这些该如何克服和防范？

宋丽娜：在婚恋转型中，由于生活情境的快速转变与家庭结构的深刻变动，农村务工女性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和前所未有的风险。她们以感情为中心，但是感情却无所依附，缺乏安全感；享受父母的庇护，却也要承受着感情上的压抑和父母的干预；不考虑现实条件，却往往被现实实训。女性面临的这些困境给她们带来了婚恋风险：失恋、离婚、欺骗、经济困境、暴力、权益受损等。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在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观念态度等层面的融合和经营不足，只求婚恋的功能性满足使其超越性的价值被忽略，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和道德规范丧失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婚恋日渐缺失了村社供给的系统性保护。

婚恋转型的完成与出路

记者：书中讨论了80后和90后两代新生代农民工，认为80后是有着“浪漫革命”的婚恋变革的第一代，而90后则处于更注重“婚恋技术主义”的“后自由恋爱时代”。但他们也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处于充满变化的婚恋转型中。这种转型大概何时会趋于成熟？

宋丽娜：婚恋转型的内在逻辑线索有两条，一条是明线，以“感情”为中心重新组织起婚恋的实践方式；另一条是暗线，以“体验”为核心形成婚恋秩序，一方面完成婚恋模式对于周边社会情境的功能调适，另一方面形成对于婚恋实践的合法性论证与伦理建构。

目前来看，在婚恋中以“感情为中心”已建立起合法性基础，而以“体验为基础”的婚恋秩序却难以有效达成。这是因为它与既有的婚姻制度相互匹配，也要重构婚恋关系的合法性和为婚恋伦理论证；且内涵的变化还要与外在形式相互适应。只有婚恋中以感情为重的内涵能够匹配恰当的婚姻制度，并且能够在社会层面上自我论证、与其他社会制度相互嵌套时，婚恋转型才能真正完成。

记者：要真正保障婚恋自由，防范婚恋风险，并不能单纯寄望于农村青年个体的理性选择和婚恋技术，还要依托传统家庭伦理和现代国家政策制度所形成的保护性结构。在保护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自由和防范婚恋风险方面，未来有哪些需要重视的地方？

宋丽娜：婚恋属于私人领域，在西方社会暗含着“隐私”的性质。但在我国传统社会，婚恋却不仅是个人的事情，也是两个家庭、甚至两个村庄的事情；嵌入在村庄的婚姻制度和伦理对于个体的婚恋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流动情境，一方面打破了婚与恋之间的统一，另一方面也使得以村庄为基本的乡土性加速衰败，打破了婚恋建构的社会文化基础。如此便呈现为，婚恋虽然自由了，但确是一种“无根”的自由。因而，我觉得一方面应肯定以感情为中心的现代婚恋文化，另一方面也应有意识地建构一些有利于现代婚恋文化发育的社会机制和政策倡导，以尽快适应新型婚恋秩序的塑造。

比如，在宏观层面加大对高额彩礼、婚恋乱象的治理，进行文化宣传和移风易俗活动；在中观层面，建构基于地方社会基础的婚姻市场机制，形成健康文明的婚配规则和在地化的、专业化的婚恋问题解决机制，将年轻人的婚恋问题解决在当地；在微观层面，引导形成男女平等、独立自主、尊重接纳基础之上的现代婚恋关系，配套以健康科学的抚育体系和边界明确、健康友爱的现代家庭关系，以此为基础来重构现代化的婚姻家庭伦理。

要防范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婚恋风险，必须调动地方社会对于个体婚恋问题参与的主动性，并且重建婚恋问题的“公共性”，即在合理健康的规则基础之上，重构地方社会对于婚恋问题的话语权，让公共性成为规范婚恋行为的重要防线。

寻访「铁姑娘」：重拾她们不让须眉的奋斗史



二三八号女船长黎亚香



英姿飒爽 峻岭摄 《人民画报》1971年第1期

· 阅读提示 ·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以“铁姑娘”“花木兰”“穆桂英”“三八女子班/连”等命名的女性劳动集体以浩大的声势集中涌现。她们开动电动机车、管理油田采油设备、带电作业于高压线上，下探到煤矿深井……她们一度突破了固有的行业性别边界，前所未有地提高了自身的能力和信心。在那一代女性豪气干云的故事似乎已淡出历史的今天，回望新中国的工农业发展史，她们特别的足迹依然值得铭记。

■ 金一虹 张震宇

20世纪50年代末的跃进年代，以“铁姑娘”“花木兰”“穆桂英”等命名的女青年突击队曾活跃在农田、水利工地上。到了70年代，在毛泽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下，以“铁姑娘”“三八女子班/连”命名的女性劳动集体以更浩大的声势集中涌现。她们开动电动机车、管理油田采油设备、带电作业于蓝天白云间的高压线上，她们下探到煤矿深井、潜入深海珊瑚礁盘之间……她们一度突破了固有的行业性别边界，前所未有地提高了自身能力和信心。在那一代女性豪气干云的故事似乎已淡出历史的今天，回望新中国的工农业发展史，她们特别的足迹依然值得铭记。2018年，“新中国70年人物口述史”研究开启了我们的寻访当年“铁姑娘”(包括所有以“三八”命名的女性劳动集体)的旅程。在一年多的寻访过程中，许多鲜活的人物和故事被重新发现，“铁姑娘们”的奋斗史和心灵史被再度勾勒。

南海“海燕”：“三八”号女船长黎亚香

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在1973年有一个歌颂妇女“顶起上半边天”的相声——《海燕》，讲一个叫海燕的女船长带领一群女青年在海上独立作业的新鲜事。由于挑战了当地“女人迈网要破，女人下海船要翻”的性别禁忌，这个故事令人格外印象深刻。我们在三亚访问的黎亚香曾是20世纪70年代巡于三亚、西沙的“三八号”渔船的女船长，是现实版的海燕。

与相声中渤海湾一带女人不能下海的传统不同，三亚的渔家女人从小就习以为常、以海为伴。然而，尽管她们和男人一样扯帆、摇橹、拉网，却仍被看作“煮饭婆”。在集体制记工分时期，女人的工分总要比男人低三、四折(亚香戏称其为“煮饭工分”)，而女人想在渔业生产上独当一面更是史无前例。据前大队书记郑石喜介绍，1972年，生产队给了妇女两条旧的机帆船，称为“三八号”女子渔船，由一正两副三个女船长指挥，有三十几个女渔工，另派一个男渔工掌舵。正船长陈马岭因身为大队民兵营长，并不常驻渔船，而男渔工与另一个女副船长后因故调离。于是，18岁的黎亚香就成为独领两条机帆船的船长。

看亚香年轻时荷枪扬帆的照片，怎一个“英姿飒爽”了得！由于沿海特殊的地理位置，捕鱼的姑娘们都是劳武结合，战备最紧张时，都须荷枪出海捕鱼。姑娘们围捕灯光鱼，经常要在海上连续作

业两三天。满载而归后还要到渔港出货，一担担把鱼挑上去，劳动强度相当大。虽然这些姑娘都在渔船上长大，但是独立出海依然需要过人的勇气和毅力。遇到大风几天回不了渔港，淡水都用尽是有常事。即便大风滔天，船长亚香也要爬到桅杆上看潮水流向。

丰收的喜悦和劳动价值被肯定是姑娘们辛苦付出的最好回报。“我拿的是和男人一样的最高工分，13分！”亚香调皮地说：“既然我们和男人干得一样了，生产队还不好意思给我们记‘煮饭工分’么？”当然，除了工分，分配时还要看捕鱼的成绩。由于“妇女号”出海勤、团结合作得好，姑娘们努力掌握鱼汛和捕鱼技术，她们捕鱼的成绩不亚于男子。亚香还记得，有一次遇到好的鱼汛，晚上9点开始灯光围捕，到第二天中午12点就捕获了一百多担(一担一千斤)灯光鱼。

亚香的胆识和主见不仅表现在组织捕鱼生产方面。解放后，政府帮助渔民上岸定居，但受不让女孩识字的传统影响，渔家女孩少有读书的机会。小小的亚香却很有主意。有一次，她对妈妈说：“你借我两块钱，我去报名读书，长大了我会挣钱还给你。”就这样，她终于争取到读书的机会。但这也意味着小小年纪的她要在海边渔村独自生活。当我们问到一个人生活会不会害怕时，她说：“有时也会害怕，但想到上学就不怕。”渔家姑娘以海为家，但却希望能凭借知识闯出更广阔的路。她坚持读到初中，虽未过完父亲、下海当了五年船长，但学知识长本领的意愿始终没有放弃。她在到海口港为“妇女号”打制大马力机帆船期间，还挤时间进修了中专。此后她做过轮船服务员、电台广播员，最终从三亚微波站的技术岗退休。亚香说，她也影响和带动了妹妹读书，她和妹妹是全家长辈的骄傲。

小英雄陈马岭和“女民兵照”

在黎亚香的故事里出现过一个人名字：陈马岭。陈马岭因生于马岭山而得名。而她少年时名声大振，是因为“护岛夺旗”的故事。

1958年初，渔业社社长何石碌带领4艘翘尾渔船去开辟西沙渔场，13岁的陈马岭以半劳力的身份随船同去。2月15日，船队抵达西沙永乐群岛后，各队各组按计划开展围网捕鱼生产。陈马岭因为年纪小被安排留在大船看守，大人们则驾小船在不远的礁盘作业。中午时分，一艘汽艇开过来与大船相撞，4个南越士兵爬上船来欲意驱赶。小英雄大声说：“这里是我们渔家人世代代抓鱼的地方。”当看到其中一个士兵爬上桅杆扯下五星红旗时，她奋不顾身前去和他夺旗，大声叫喊，并狠狠地咬那个士兵的手。大人们听到小英雄的喊声后，弃下渔网赶回大船。南越兵见中国渔民人多势众，才坐着汽艇跑了。何石碌社长当时激动地抱起小英雄说：“小英雄真勇敢，是我们的小英雄！”两个月后，船队回到三亚港，在全社社员大会上，何社长讲了小英雄护岛夺旗的故事，并号召全体社员学习陈马岭爱党爱国的精神。

在亚香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她的家乡，原南海公社榆港大队(今三亚市天涯区榆港社区)参观村史展览馆(现称三亚渔家陈列馆)。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竟是那张曾为人熟知的南海女民兵照片，她，就是陈马岭？

这张题为“英姿飒爽”的著名照片曾作为《人民画报》1971年第7期的封面，作者署名峻岭。陈马岭少年成名后，成为公社民兵营营长兼“三八”号女子渔船船长，2006年去世。因为她生前不识字，没有留下更多文字记录。推算起来，拍摄这张照片那年她应该是26岁。照片透着渔家姑娘不加雕琢的质朴、淳厚，无声地讲述着那个火热的岁月，那些不让须眉的“铁姑娘们”。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中国视窗

《性别、圈层与嵌入：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作者：钟曼丽 杨宝强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只有女性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市民，才可能带动整个家庭融入城市。文章基于性别、圈层、嵌入的维度，构建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多维分析框架。文章从身份歧视、职业选择、工作环境方面分析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身份与性别排斥；从“群体边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分析了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获取困难及圈层跨越障碍；从城乡二元“隔离”与流动的“家”层面分析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和关系型嵌入障碍。在此基础上，本文遵循“赋权—增能—自助—他助”的思路，提出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可行路径。

来源：《新疆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从女子法庭看“妇人之仁”的司法价值》

作者：李勇

“妇人之仁”和“丈夫之仁”是两种典型的仁爱类型。长期以来，“丈夫之仁”被褒奖，“妇人之仁”却被贬低。女子法庭的经验表明，“妇人之仁”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女法官特有的爱心、细心、耐心等品质为妥善解决婚姻家庭矛盾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女法官看重关系的特质有助于合理化解邻里纠纷；此外，在女法官送法下乡和女子法庭的便民举措中，深刻地体现着对弱势群体的怜悯。从法治层面上讲，“妇人之仁”将关注点从与权力相关的政治构造、陈述、抗争转移到了对生命的滋养、人性的成长和才智的陪护上来。从社会层面上讲，融合“妇人之仁”的柔性司法对于修复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乡土中国、性别立场与伦理观——对中国女性乡土写作的思考》

作者：郑斯扬

女性乡土写作将女性的发展与乡土中国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从性别和历史的的关系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性别、主体性与乡土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艺术主题，塑造了一系列富有本土性、现实性的多元女性形象，揭示出中国女性传统和女性观念的内在统一性，以及随时代发展的女性精神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女性乡土写作在性别伦理阐释和再现乡土文化方面的创见，为中国性别理论建设提供了可依赖的资源，成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展开对话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被重塑的性别立场与乡土历史的碰撞，产生了话语结构、审美体验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而这必然成为我们民族自我书写的组成部分，也将汇聚为民族文化建设的崭内容。

来源：《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范语晨 整理)